

的时间，结果却使先生失望。这个女学生虽没有被说服，但后来在汉口上岸时，时值狂风暴雨，先生一手提着网篮，一手挽着那个女学生，并把他的一把阳伞交给她撑着，一直把她送上黄包车。伞被大风吹翻了，他也毫不顾惜。这个印象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1923年夏天，我又在上海会见了王先生。这一次我记得有这样两件事：

他来找我给他引路到宝山路一个僻静的小弄里去会恽代英先生。他们谈了许久的话。

后来他听我说起有个四川学生要到法国去留学，他就约我介绍他去会会面。见了面以后，先生首先问那个学生：

“你到法国去学什么？”

“我去学国际公法。”那个学生回答。

“在这样的时代，你去学国际公法有什么用？你去学点有用的东西不更好吗？”

“国际公法就没有用吗？”

先生见话不投机，就起身走了，我没有和他一道走。谁知，这竟是我与先生最后的一次见面。我转过身来问我那位朋友：

“你不是说到法国去学文学吗？怎么又想到要学什么国际公法了呢？”

“我同他开玩笑的。”

不错，那个时代就是有一些知识分子偏要用这种态度来对待先生。想起来令人非常痛心的。

1924年我回到成都，就听到朋友们纷纷传说，先生于2月间从上海经海道到广州开会，后来步行经广西、贵州回川，

在川黔途中遇害。一说是是在泸州被四川军阀杨春芳杀害，一说是是在赤水县土城被贵州军阀周西成杀害的。后来我在江油会见先生的家属，才确定是在土城与泸州之间跟家庭失去联系的。

关于先生于1922年至1923年在成都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们和青年们为四川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与反动政府展开了激烈斗争，以及领导长机帮工人展开工人运动等事迹，因为我不在成都，无法知道，也就无法写下去了。

今年是先生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贡献出生命的三十五周年，同时也是先生诞生的七十二周年。先生虽已与世长辞，但是先生的理想却已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出了灿烂的花，结成了丰硕的果实。

(原载《草地》1959年第7期)

回忆王右木烈士

杜钢百

1921年，我以旧制四年制中学二年级学生借他人毕业文凭考取成都高师，引起广安县中学毕业未考上高师的同学生不满。他们向广安县视学刘卓群（威远县人，高师第一届毕业）反映，请函高师查询我考卷成绩实情。当时，王右木先生任高师学监（即训导主任），他在查证中知我成绩尚佳，便约我谈话，因此我认识了王右木先生。

通过多次接触，我得知王先生留学日本，初读应庆大学，后入明治大学。在这期间，认识了李大钊、陈独秀，他喜阅革命史，尤喜日本早期工人运动领导者幸德秋水所译之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此时，他也加入了李大钊在日本组织的“神州学会”。

回忆第一次谈话时，他问我：“你们报考资格，一是历届中学毕业生，一是具有同等学历者，你自信能考取，何必要借别人凭照？”我当即告诉他我投考时的思想情况说：

“听说有毕业文凭的考生各科平均六十分以上的就可录取，考上机会较多；而同等学历报考者要求分数更高，录取机会较少。我借文凭报考，原因是怕名落孙山”。王右木先生认为我吐谈诚实，直认不讳，便告诉我：“你中文、英文、算术三科成绩很好，中外史地、动植物各科成绩也不错，我们

学校已复你县教育局，就是照同等学历标准，你也应该被录取。但你切不要自满，必须奋发努力求学向上，尤以多阅读新书及报刊，树立革命人生观，争取作新时代进步的教师为佳。”

以后，王右木先生又与我谈过几次话，其中一次对我影响很大。他说：“你旧学根底还好，我知道你不大高兴写白话文，希望你不要作‘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迷信者，文言固不可完全废除，但世界是进化的，要留心时事、新事物，多阅读新书报，才能适应潮流，推进社会。”当时我家的叔伯都崇敬并研廖季平先生，我常听传达廖先生讲《礼运》篇大同小康学说，又讲春秋《公羊》“张三世”、“通三统”诸义。我因此回答说：我们中国和西洋都有社会主义。他和蔼地向我笑着说：“难道说中国与西方的社会主义不能合流吗？你不要太迷信中国先哲旧说，要研究新的社会科学，从旧的国故中走出来，进入革命行列，做中国的新青年。”并介绍《新青年》、《新潮》杂志给我。

1922年吴玉章同志担任成都高师校长，王右木先生因知道李大钊在北京已组织有少年中国学会，恽代英是武汉少年中国学会的骨干分子，他便向吴玉章建议，由吴玉章出面请恽代英同志来成都，并嘱童庸生转知杨闇公到成都，拥护吴玉章同志脱离成都赤心社，转入社会主义马克思组织。

李大钊在北京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时，经由第三国际派来乌廷斯基，而马林，而李克诺夫斯基，最后派越飞来华，认为中共建党之后必须有“一个向军阀与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战线”（文章见《向导》21期），这就树立了中共统战工作而主张第一次的国共合作路线。关于前期倡导统一

战线，王右木与李大钊已有书信来往论述过。李嘱王右木在四川留心发现国民党中进步分子，争取他们共同开展“联合战线”工作。在当时，浅薄而幼稚的我，颇不以联合战线为然，因为我在广安县眼见国民党抢官抢钱之“巫教”，以后才渐渐在王右木先生的影响下转变了认识。1921年前，王右木先生曾在成都创办的读书会，主要读物是报纸和社会主义讨论集、《新青年》、《新潮》等刊物。读书会后来改名为“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多阅读马克思书籍及李大钊“问题与主义”的论战等文章。

王右木先生为了在学生中传播新思想，在成都创办过《人声》周刊，一周出一期自编自印自己发行。西南师范学院段调元教授、重庆九三学社主委税西恒曾向我说过，他们两人读过《人声》周刊，是王右木亲自往访特意送去的。

吴玉章来到成都任高师校长前，王右木早已在成都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我就是他和童庸生介绍参加的。以后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是我到北京进北大、清华两校后才改的。是时我已经见着了陈毅与李大钊同志。1926年，我由北京绕道回川，在汉口见着陈毅，他要我同去万县工作，因而参与了反击英帝国主义制造万县“九·五”惨案的斗争。后又再由朱德、陈毅同志联名写信介绍我在重庆会晤杨闇公同志。谈到王右木时，杨说：“王右木在1923年赴广东出席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是由恽代英到四川后传达李大钊的意见决定的，即四川的党虽然没有成立，但王右木可以个人参加去赴会。”周钦岳告诉我：王右木先生去出席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到重庆时，曾去《新蜀报》访友，周钦

岳见到过他。

1980年10月

(原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八辑)

忆王右木老师

何克希

1920年我还没满十四岁的时候，考进了成都高师附中。王右木先生是高师的经济学教授，在我中学毕业的那一年，他曾教我们经济学，也便成了我们中学的老师。他是成都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的引路人，在他的影响之下，许多同学积极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王右木先生身材适中，相貌雅秀，常穿一件竹布长衫，蓄一头拿破仑式的头发，讲话有很大的说服力和鼓动性。他是当时成都学生运动的灵魂，在同学们的心目中有着极深刻的印象。高师位于成都的皇城内，是成都学生运动的中心，皇城则是学生集会的中心。我们附中也在皇城内，每次活动我们都参加。学生集会时，只要王右木先生到来，无论大会小会，都会立即活跃起来，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我虽然年纪还小，知道的事情不多，但因学校的广大师生都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我就能常见到王右木先生，并且得到教益。